

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关系研究

刘桂花◎著

张外信

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关系研究

王 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关系研究 / 刘桂花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108-7416-1

I. ①政… II. ①刘… III. ①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研究—中国②公民—参与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30.1②D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6766号

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关系研究

作 者 刘桂花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08-7416-1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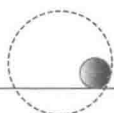
政府信任式微在全球已成蔓延之势，成为各国政府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面对这一难题，学者们开始关注并思考：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该如何建立并得以维持？于是，信任——作为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中心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这其中，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关系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在我国，截至2011年底，城镇居民人口达6.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51.23%，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量。十八大以来，中央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这意味着未来城镇居民这一群体还将大幅增加，城镇居民在我国经济政治领域将扮演主要角色，其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部门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通过对传统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审视，学者们已经发现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信息不对称、决策主体单一、不能满足公众的偏好、只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治理模式，改变单中心的行政治理，引入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在公共决策中更多吸引私人部门、民间组织、公民等的参与。政府信任、公民参与无疑已经成为新时期政府治理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那么，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因素影响了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信任和公民参与之间有无关联？如果城镇居民对政府信任较高是否会导致公民参与的发生？为了厘清上述问题，为政府部门提升几近跌至谷底的信任提出对策，改善我国公民参与极低的现状，以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轨迹为背景，通过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笔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丰富政府信任和公民参与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上为政府信任和公民参与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及国外实践经验发现，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受到被信任方特征（政府形象、政府能力），城镇居民与政府部门间的关系特征（交往经历、信息公开、对公务员的信任）和制度特征（制度的公正性、制度的

完善性)的影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信任可分为契约型信任、合作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确定性因子分析,公民参与维度划分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参与和社区参与三个维度。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信任的前因,中介变量则是信任的几个维度,公民参与是本文的结果变量,而信任方特征(即城镇居民的信任特征)是本文的控制变量,这是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信任的前因与信任的三个维度构成本研究的信任形成机制;城镇居民与政府间由信任达至公民参与的路径分别由信任维度和公民参与维度构成,而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模型则由信任形成机制及信任到公民参与的路径构成。

根据研究设计需要,本研究所用的主要分析方法有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理论梳理部分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先在成都市进行了两次小样本测试,大样本选择在我国东、南、西、北、中几个区域的十个城市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形象与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能力与信任显著正相关;交往经历与信任显著正相关;信息公开与信任显著正相关;对公务员的信任与信任显著正相关;制度的公正性与信任显著正相关;制度的完善性与信任显著正相关;契约型信任与公民参与部分显著正相关;制度型信任与公民参与显著正相关。

本研究结论表明,政府部门要提升自身在城镇居民心目中的信任度,必须在依法行政履职尽责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能力,严厉惩治各类贪腐现象,维护政府部门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增加和城镇居民交往的机会,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准确及时地进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政府;更为重要的是,完善制度建设,从制度上确保城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的途径和权力,实现善治到善政的转变。



自 序	1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3
1.3 研究内容	4
1.4 研究方法	6
1.5 技术路线	7
第 2 章 信任与公民参与研究述评	8
2.1 关于信任的研究	8
2.2 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	25
2.3 信任与公民参与的关系研究	29
2.4 本章小结	32
第 3 章 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33
3.1 研究模型的构建	33
3.2 政府形象与政府能力对信任影响的假设与模型构建	34
3.3 双方交往经历、信息公开及对公务员的信任与信任的关系与假设	37
3.4 制度的公正性与完善性对信任影响的假设与模型	40
3.5 信任与公民参与关系的假设与模型	43
3.6 本章小结	46
第 4 章 研究设计	47
4.1 问卷设计	47

4.2 抽样设计与方法.....	56
4.3 数据分析与统计检验.....	58
4.4 本章小结	106
第5章 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	107
5.1 政府部门特征对信任影响的假说检验	107
5.2 城镇居民与政府间关系特征对信任影响的假说检验	115
5.3 制度特征对信任影响的假说检验	124
5.4 信任对公民参与影响的假说检验	131
5.5 本章小结	141
第6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146
6.1 研究结论	146
6.2 本文的主要创新	149
6.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151
参考文献.....	153
附录 回归残差图、直方图和累计概率图	169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各国的发展经验揭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当一国或某地区人均 GDP 达到 1000—3000 美元时，该国或该地区既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同时也进入了各种矛盾多发时期。如果能较好地处理发展与矛盾的问题，则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否则将对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21 世纪的中国，正进入这一特殊时期。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忽视了社会问题的治理，从而导致各类社会问题频发，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一个极小的事件即会引发群体性冲突，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而“郭美美炫富”事件即毁掉了“红会”的百年声誉。这些事件无不表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正面临极大挑战。

政府信任的衰落在中国并非特例，自 20 世纪中叶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发展时期，人类无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在数量和复杂性上均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全球治理失败的蔓延导致政府信任衰落成为全球化浪潮。面对这一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难题，学界从各视角对其进行了探讨，对政府处理与公民间的信任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益启示。

从公共管理的研究视角出发，张旭霞（2004）认为，官僚制运作的弊端是导致政府信任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官僚制行政只关注政府自身的效率和自身的运作模式，而忽视其服务对象公众的偏好与需求，在公共治理中往往出现错位、越位、失位等现象，甚至出现与民争利行为；对于社会中出现的各类矛盾与问题，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又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妥善处理。政府在错位的角色中疲于奔命、不堪重负。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失望，对政府的疏离感、冷漠感也越来越强，对政府的信任感也明显降低，而频频曝光的贪污、腐败等现象更加剧

了政府形象的坍塌。

2011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口达6.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51.23%,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这意味着未来城镇居民这一群体还将大幅增加,城镇居民在我国经济政治领域将扮演主要角色,其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是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力量。通过对传统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审视,学者们已经发现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信息不对称、决策主体单一、不能满足公众的偏好、只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治理模式,改变单中心的行政治理,引入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在公共决策中更多吸引私人部门、民间组织、公民等的参与。作为服务对象,他们对政府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政府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福利、如何实现与维护公共利益等拥有真正的发言权。这些组织或个人参与公共治理便成为题中之义,这也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西方各国政府改革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理论研究与行政改革相互促进,互相激荡,主张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平等关系。从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务到治理理论,其核心价值无不主张最大限度地代表公民表达公共利益,强调公平、平等、合作、开放的行政观,同时强调公民和政府间的合作,强调政府的信息公开,即实现公民对政府社会治理的知情权,这无疑为化解政府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提供了解决之道。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处于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而要构建和谐社会、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就是保证政府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保证公民和政府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信任是连接政府和公民之间和谐关系的桥梁,它在和谐政治秩序的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社会主义和谐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坚实的政府信任关系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具有极强公信力的政府,才能有效引导社会走向和谐。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及对公共事务等的积极参与,是政府实现其管理功能的重要资源之一(周毅之,2001:43)。因此,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公民始终支持政府的各项公共政策,支持政府对各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目前党和政府必须要思考的主要问题。

当前,民主化已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公民要求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治理,他们对知情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我国,随着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推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公民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公民要求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事实上,不断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表明了公民参与的热情。那么,这些参与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因素又影响或阻碍了公民的参与?许多学者给出的答案是相互间的信任,认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导致公民参与政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

一。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增加公民参与各项活动的关键。然而,众所周知,当前中国政府的信任度普遍偏低,阻碍了公民的参与意愿。事实上,信任是相互的,政府部门对公民的不信任和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均会抑制公民参与行为的发生。所以,只有正确把握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并建立起公民积极参与各项社会管理的热情,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才可能实现。

现状是: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普遍不高,城镇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和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也较低。于是政府部门便面临如下问题:城镇居民对政府部门的信任该如何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信任机制如何构建?信任维度又该如何划分才能与中国国情相匹配?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与公民参与有何关系?如何才能提升城镇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本研究将针对这些问题,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试图在理论与实践领域丰富信任与公民参与的研究,为提升政府信任水平和促使更多城镇居民积极参与各项社会管理活动提出建设性指导意见,以提升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并促使构建和谐社会和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1)通过国内外关于公民对政府信任和公民参与的理论研究,探索公民对政府产生信任的机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公共治理实践对其进行完善;同时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维度进行适合本土化划分,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探讨公民参与的可能维度,由此拓展适合中国国情的信任和公民参与的研究领域。(2)本研究将主要探讨城镇居民与政府间如何才能建立信任的最佳模式,探讨信任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尤其是不同的信任类型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并寻求不同信任类型与不同参与类型的最佳匹配方式,因此,本研究将以城镇居民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1.2.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信任与公民参与的研究范畴。目前,中国学

者对信任和公民参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外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就目前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集中在企业与企业,或企业与供应商间的信任关系,或人与人间的信任关系的研究,以及消费者对企业信任关系的研究,也有涉及公民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以及公民参与的研究,但研究尚不深入,大多停留在对西方公民参与范式进行介绍与规范研究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在我国,城镇居民已经超过农村居民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拓展城镇居民与政府信任关系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本课题将通过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城镇居民和政府间的信任关系以及信任和公民参与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2. 实践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有利于指导城镇居民科学、有效、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善治理论要求摒弃单中心治理模式,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要求建立以政府、私人部门、民间组织和公民等为主体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但如何有效地引导公民进入社会治理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管理的主体是目前政府部门和公民自身面临的难题,也是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本课题通过实证分析,试图为城镇居民通过对政府的信任这个桥梁搭建起有效参与的机制。

同时,本课题的研究也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城镇居民与政府部门间信任机制的建立以及参与机制的形成,试图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政府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3 研究内容

通过国内外关于公民参与的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对于促进城镇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或政治活动的因素分析大都聚焦于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通过对信任的定义、信任的维度、信任形成机制的文献述评发现,学者们都从自身研究角度出发,因而得出的结论也迥然不同,不过都认为信任对公民参与会产生各种影响,认为信任是促进城镇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条件。基于此,本研究从“信任”这一视角出发,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探讨城镇居民与政府间如何建立信任机制,探讨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任维度划分,探讨不同信任类型对公民参与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同时,通过数据收集进行实证研究,探索

我国公民参与的维度,进而探讨由信任机制建立达至参与各项社会治理或政治活动的途径,为政府部门提升自身信任度及提升公民参与积极性提供有效的对策和建议。

1.3.1 城镇居民与政府部门间信任机制的建立

本研究将研究城镇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和政府信任机制的建立。本研究以城镇居民为切入点,研究其对政府的信任及与公民参与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城镇居民是施信方,政府部门是信任对象。也就是说,本文要研究的是城镇居民对政府部门的信任问题,而不是相反。从信任的产生过程出发,信任的影响因素可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分别是被信任方(政府)特征,包括“政府能力”和“政府形象”;施信方(城镇居民)和被信任方(政府)的关系特征,包括“交往经历”“信息公开”“对公务员的信任”;制度特征,包括“制度的公正性”和“制度的完善性”;施信方特征,包括城镇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政治面貌等。

本研究中将信任方(政府)特征、施信方(城镇居民)与被信任方(政府)的关系特征、制度特征作为信任的前因变量,即自变量,将施信方特征作为影响信任与公民参与的控制变量。本研究暂不考虑控制变量对信任的影响。

1.3.2 城镇居民对政府信任类型的划分

通过梳理前人关于信任的文献后,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对信任的划分是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之下以及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来考量的。但这些关于信任类型的划分并非完全适合中国文化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一个“熟人”社会和“关系”社会;加之中国的悠久历史,经历了漫长传统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正处于历史转型期。西方学者对信任类型的划分显然不适合具有儒家传统文化和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轨迹的中国。因此,基于国外学者对信任的划分,并充分考虑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轨迹,通过实地访谈,本研究将信任划分为“契约型信任”“合作型信任”和“制度型信任”,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1.3.3 城镇居民与政府间信任对公民参与的影响

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信任是促使公民参与产生的重要因素和动力,而且,信任类型不同,其对公民参与产生的影响也有差别。因此,根据本研究

对信任类型的划分及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的公民参与类型,本研究试图验证“契约性信任”“合作型信任”“制度型信任”与可能的几种公民参与间的关系,从而探索不同信任类型对不同公民参与的影响,以促使政府部门通过适当的途径提升不同的信任水平,促使公民不同程度地参与各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和透明化,增强政府的回应性,并实现公共管理语境下的善治。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献法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采用文献法进行归纳和梳理。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信任和公民参与的各种研究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将之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切入点。同时,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轨迹,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对信任类型进行划分,探索城镇居民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形成机制,探讨城镇居民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和公民参与间的各种关系,从而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

1.4.2 访谈法

运用非结构化的田野调查法,对笔者所在的成都市部分城镇居民及公共管理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的深度访谈,获取他们对政府信任及公民参与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详细分析访谈所得内容,结合本研究确定的变量,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修改国内外学者们曾用的研究量表,从而设计一套适合我国城镇居民与政府部门间的信任和公民参与的新量表。

1.4.3 社会调查法

问卷调查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通过实地发放问卷(研究者亲自前往、亲朋好友和学生前往)、邮寄问卷、Email等形式发放问卷。首先在笔者所在城市进行小样本问卷调查,回收问卷后通过SPSS17.0检验量表中各题项的信度和效度,待获得合理的信度和效度后,进一步修改问卷,然后再进行大样本的问卷调查,从而确保问卷的科学可靠,保证研究的可信度。对

回收的大样本问卷，通过 SPSS17.0 和 LISREL18.70 软件进行效度和信度检验，最后通过统计结果验证本研究的假设。

1.5 技术路线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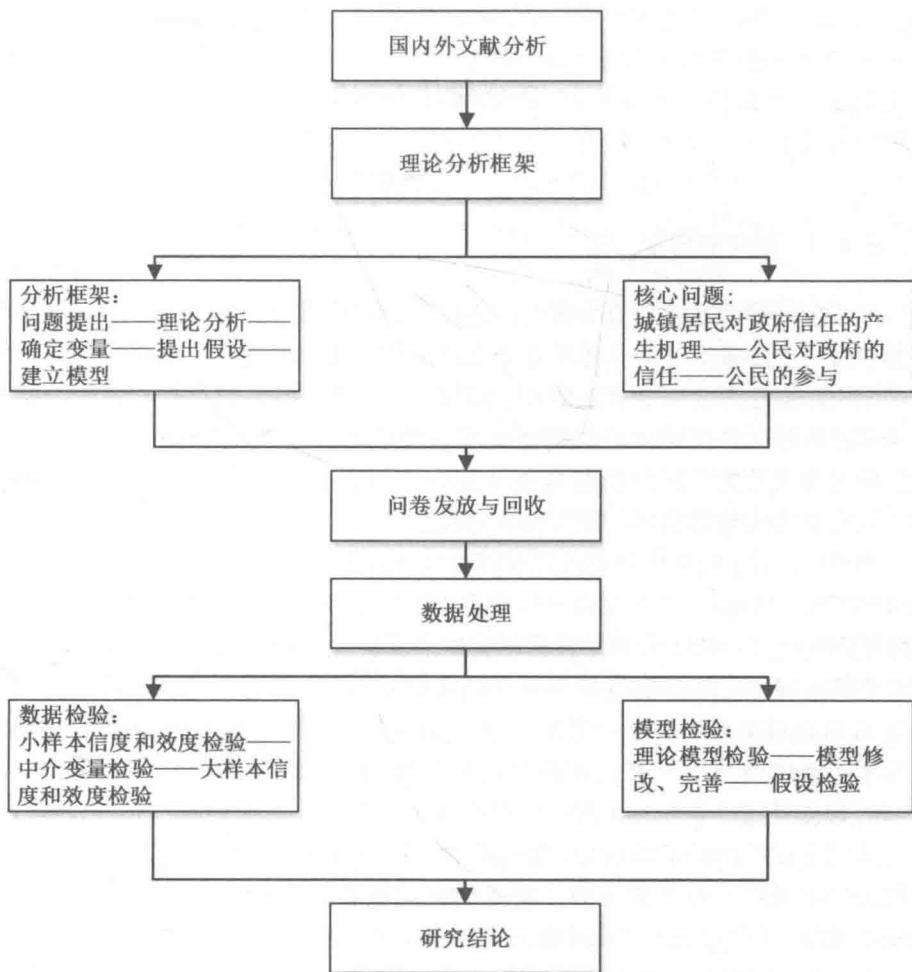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第2章 信任与公民参与研究述评

2.1 关于信任的研究

2.1.1 信任的界定

关于信任的研究，西方学者们已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关于信任的思想，也有着自身古老的根源，并且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历程。而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并思考：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该如何建立并得以维持？信任——作为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中心问题便受到学界广泛关注（Sztompak, 2005）。由此，西方学者开启了对信任的多角度研究，学者们在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对信任的研究均有涉猎。

在西方，对于信任的研究可以理解为是对英文“trust”一词的研究。从词源学角度探究，“trust”在第二版《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解释如下：（1）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某些品质被人信赖，或相信某种陈述是真实可靠的。（2）自信期待某件事物的出现。（3）义务、忠诚和可依赖性。（4）有信心对某人或某事的寄托。（5）对于一个买者拿现货而将来付钱的能力和意向的信心。（6）将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以<法律>的形式托付给某人，另一人的利益可通过掌握和使用这笔财产得以实现。

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区分“trust”和“confidence”这对同义词是研究信任的又一出发点。有学者认为，信任程度的强弱是二者的主要区别之一，即“trust”的信任程度强于“confidence”（Misztal, 1996）。也有学者认为，要描述一个人对制度的信任应用“confidence”，而描述一个制度的界限和空隙的处理态度则是“trust”解决的问题（Seligman, 1997）。而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 1988）的观点是，“confidence”与危险相联系，这种危险存在于没

有选择的事物中,“trust”体现的是风险及主观上无法进行选择的事物或现象。

在深厚的宗教文化影响下,西方学者们怀疑无神论者是否还讲信任。信任的特征之一便是“无条件”,它于人和上帝的关系中产生。洛克认为,约定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是保证诺言和契约完成的重要保障,人们之所以履行诺言,是因为惧怕作为第三方的上帝的愤怒(Misztal, 1996)。然而,即使西方信任的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它也离不开世俗的语境。在基督教产生不久,“fede”是罗马人的语言中用于表达信任的词汇,其含义为非理性和不能计算(Misztal, 1996)。

洛克、霍布斯、韦伯、杜尔凯姆等的研究对信任也有所涉猎,但他们几乎都未对信任有过专门的论述。对信任进行详细论述的有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 1950),他指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股综合力量之一是信任,如果人们间不能彼此互信,社会就会瓦解。如果信任无法达到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所要求的强而有力,则目前人类间存在的一切关系均难以持久。后来,齐美尔(Simmel, 1978)又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现代生活的基础是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强度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社会学家科曼(J. S. Coleman, 1990)则做出了更为理性的选择,他指出,信任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这种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在风险中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诉求;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监督与惩罚的成本。以色列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 & L. Roniger, 1984)谈到现代信任时指出,将信任与更广阔的工具权力和更广泛的意义相结合,从而使信任得到扩展,这至关重要。吉登斯(Giddens, 1991/1998)则将信任定义为:信任产生于儿童的早期经验或经历,它是对他人的不间断的相信和对客观世界的相信。信任作为一种自我保护,可以提供对日常生活中对各种应对情况的保护。

自社会学者对信任进行研究之后,心理学家们从各个侧面开始了对信任的研究。他们认为信任是对可能的不确定的收益的事件做出的非理性选择行为。多依奇(M. Deutsch, 1958)则将囚徒困境方法投入实验,他也是第一个通过囚徒困境对信任进行研究的学者,同时也是较早通过研究冲突的解决来对信任进行研究的人。他指出,一个人对某事的信任,表示他希望这件事成真,为实现此目标,他(她)会采取可能产生两种结果的行为,分别是与他预期相反的结果和与他预期相符的结果。这两种结果则会带来两种心理影响:正面心理影响和负面心理影响。正面心理影响来自与他预期相符的结果,而负面心理影响则来自与他预期不相符的结果。负面心理影响大于正面心理影响时,会导致他对该件事的不信任。赖兹曼(L. Wrightsman, 1991)指出,信任是一种可靠的信念,这种信念体现为个体对他人的某些品质的判断,这些品质主要包括个

体的诚意、善意及可靠性。罗特 (J. Rotter, 1967) 对信任的界定为: 所谓信任, 是一种对他人在言辞、承诺及口头或书面陈述方面是否可靠的一种期望。萨波尔 (C. Sabel, 1993) 指出, 信任是指信任双方均认为对方不会利用己方缺点进行攻击的相互信心。

在经济学领域, 经济学家们也展开了对信任的研究。阿罗 (K. Arrow, 1974) 认为, 信任在经济交往中起着有效的润滑剂作用。他 (K. Arrow, 1975) 指出, 世界上有些地方之所以经济落后, 或存在落后现象, 即是人们间缺少信任的缘故。经济学家赫希 (F. Hirsch, 1978) 指出, 信任是一种公共品德 (public good), 这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93) 构建了契约规制模型, 他认为每个人都是契约人, 为了达到自身利益, 人们必然要追求机会主义, 组织是保障人们有限理性的一种方式, 如果控制和监督是有效的, 则人们对信任的需求将会减少。科尔曼 (J. S. Coleman, 1990) 则从委托—代理角度出发, 认为信任是一种风险行为, 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不断地反复博弈之后, 并经过理性计算后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从上述经济学家对信任的研究可以看出, 他们的解释充满理性选择的思想。

在政治学界, 学者们对信任也进行了广泛研究。对政府部门而言, 政府信任是代议制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Gamson, 1968; Bianco, 1994; Levi, 1997)。有学者将政府信任与对政治官员的信任等同起来, 认为对政府的信任就是对政府官员的具体支持 (Citrin, 1974; Citrin & Green, 1986);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信任是对政治环境支持程度高低的度量 (Miller, 1974)。亨廷顿 (Hetherington, 2004) 则认为, 政府信任是人们对政府行为结果与他们的预期相一致程度的一种感知。史天建教授 (2001: 401) 指出, 政府信任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信念: 即便有些许遗憾存在, 但政治体系或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会产生某种称心的结果。政府信任作为一种情感存在, 其在短期内可独立于政治之外产出相应绩效, 政府信任的存在是保证政体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胡荣教授 (2007: 39) 在总结了西方政府信任研究学者的观点后指出, 人们通常将政府信任界定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的一种信心: 即他们相信政府或政治体系的运作会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

以上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角度对信任的界定见表 2-1。